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第二册

侯厚吉 吴其敬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辉生 周学恒

封面设计：王祖珍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第二册

侯厚吉 吴其敬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8·插页 4·字数 428,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4,400

统一书号：4093·82

定价：1.85元

说 明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由湖北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集体编写，侯厚吉、吴其敬同志主编，担任执笔的有侯厚吉、吴其敬、杨堪、张家骧同志。

本书有缺点和错误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82年9月

目 录

第二编 (1864——1905年)

第一章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

与中外关系1

第二章 洋务派的经济思想18

第一节 洋务派经济思想综述18

一、洋务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20

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和经济思想中的几个主要问题32

第二节 李鸿章的经济思想51

一、洋务派的首脑李鸿章51

二、“求富”论59

三、厘金和关税观点69

四、对外通商思想73

第三节 郭嵩焘的经济思想78

一、洋务派中的特殊人物郭嵩焘78

二、纪纲政教为“本”、工商制器为“末”论83

三、企业商办论87

四、通商观点98

第四节 张之洞的经济思想104

一、洋务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中体西用”论的宣

扬者张之洞104

二、“以工为本”的富强论	112
三、“商能分利，不能分权”论	117
四、“借洋债”论	125
五、外国在华设厂“于中国有益”论	131
六、“开门通商”论	136
第三章 封建顽固派的经济思想	142
第一节 封建顽固派经济思想综述	142
一、封建顽固派经济思想的特点和演变	142
二、封建顽固派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146
第二节 刘锡鸿的经济思想	163
一、敌视西法、媚外投降的著名顽固派刘锡鸿	163
二、重农抑商的生财耗财论	169
三、铁道、轮船、机器等“有害无利”论	174
四、理财观点	179
第三节 曾廉的经济思想	182
一、疯狂反对变法维新的封建顽固派曾廉	182
二、保富和务本抑末论	188
三、财用观点	192
第四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上）	199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综述	199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199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207
第二节 王韬的经济思想	230
一、较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变法主张的王韬	230
二、本末关系论	236
三、商为国本论	241
第三节 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247
一、从洋务派集团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 马建忠	247

二、重商主义的富民论	252
三、外债论	264
第四节 黄遵宪的经济思想	269
一、《日本国志》作者黄遵宪	269
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思想	273
三、劝工重商论	278
四、财政思想	285
五、货币观点	293
第五节 薛福成的经济思想	298
一、出使西欧四国大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薛福成	298
二、“商政”论	302
三、机器殖财养民说	308
四、财政思想	314
第六节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318
一、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郑观应	318
二、“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论	323
三、“兴商务”、“习商战”论	330
四、机器兴利论	340
五、金融与国债观点	343
六、企业管理思想	349
第七节 陈炽的经济思想	357
一、著名经济专著《续富国策》的作者陈炽	357
二、义利观	361
三、振兴商务论	364
四、“劝工”论	370
五、“务农殖货”论	375
六、金融思想	378
第八节 何启、胡礼垣的经济思想	387
一、提倡“新政”的居港绅商何启、胡礼垣	387

二、义利观	393
三、“兴商富国”论	397
四、“独任商民，勿加官督”论	402
五、财政思想	408
第五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下）	419
第一节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419
一、变法维新的倡导者康有为	419
二、康有为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424
三、变法维新的经济纲领	432
四、《大同书》中的经济思想	446
五、后期的经济思想	463
第二节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	476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激进的反封建思想家谭嗣同	476
二、“人我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483
三、奢俭论	488
四、机器惜时利民论	493
五、“相仁之道”的对外贸易论	497
六、其他经济观点	500
第三节 严复的经济思想	506
一、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主要传播者严复	506
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513
三、经济范畴理论	525
四、关于农工商、财政、金融的观点	552

第二编(1864—1905年)

第一章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 中国社会与中外关系

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失败(1864年)到同盟会成立(1905年),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国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体现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产生与形成了,成为中国十九世纪后期主要的进步经济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出现的洋务派经济思想,在这三、四十年间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清统治集团中和社会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由于在办洋务问题上的分歧,清统治阶级中原有的顽固保守势力也形成一个与洋务派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它的经济思想在原有的顽固保守经济思潮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某些新特点。这三个派别的形成、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本时期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进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同封建的、买办的经济思想斗争的新阶段。

上述经济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因此，要了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后四十年间我国社会经济思潮的演变与特点，就需要对本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及中外关系作一分析。

根据本历史时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情况，大体上可以1894年中日战争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失败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在这三十年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继续使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侵略中国。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后来经过交涉，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以九百万卢布“偿款”换回伊犁，而伊犁西部的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却被沙俄所侵占，此后沙俄又陆续蚕食了我国许多领土。当俄国人在西北进行侵略活动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从东面觊觎我国海疆。1874年用武力进犯台湾，未能得逞；继而于1879年用武力吞并了邻国琉球，并且将其侵略势力伸向朝鲜。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又从西南方向窥伺云南、西藏等地。1876年，英国借在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个条约中，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规定：准许英国人到甘肃、青海等地“游历”和进入西藏探访藏印路程；开放宜昌、芜湖等处为通商口岸；各口租界为洋货免收厘金之处，外商与华商运洋货入内地，在交纳子口税之后，均免纳各项内地税；内地各省与通商口岸凡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可以派员“观审”，等等。这些条款进一步扩大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难怪马士说：这个条约的“重要程度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①。法国也不例外，对我国的台湾和西南边疆同样抱有野心，并于1884年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在这次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33页。

打了胜仗，清政府却在签订和约中继续丧权辱国，同意在云南、广西的边境开埠通商，规定中国以后要修建铁路应与法国“商办”，为法国侵略势力侵入西南地区提供了条件。

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加强了。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王朝被迫为外国开放的商埠，到九十年代初期，已增至三十多处，地区已深入到中国的腹地（如宜昌）和边远的地方（如蒙自、亚东等）。由于相继获得了在中国沿海与内河的航行权，外国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海运业与河运业。1877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1892年又升至百分之七十七点八。外国人还进一步把持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除海关总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之外，各地新设立的海关税务司也陆续落入外国人手中，并且由于清政府借洋债用海关关税作担保，海关关税的处理权也部分地落入外国人手中。加上原来已取得的协定关税的特权与后来有关洋货进口的种种优待规定，都为外国资本主义加强对华的商品输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于是，进口的洋货逐步地增加了。例如，1864年进口净值为46,210千海关两，1870年为63,693千海关两，1872年为67,317千海关两，1880年为79,294千海关两，1882年为77,715千海关两，1890年为127,093千海关两，1892年为135,101千海关两。除了七十年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曾一度有少量出超之外，此后入超愈来愈严重。1882年入超为10,378千海关两，1890年则高达39,949千海关两。在进口货中，鸦片仍占很大比重，此外以洋纱洋布为大宗。到八十年代中期，洋纱洋布则取代鸦片而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西方对中国输出的商品，除鸦片之外，主要是工业品；中国出口的物资则以农产品为主，以茶、丝为大宗，此外还有牛皮、草帽辫等。但是，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其它国家日益强烈的

竞争，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况。这一切都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如何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就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

为了适应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外国资本主义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最早的一家是英国于1845年在上海设立的丽如银行分行，继而设立的是英国的有利银行（1854年）、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5年）、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1893年）和德国的德华银行（1889年）等，到甲午战争时，共有8家和其分支机构16所。它们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着中国的金融。由于1897年以前，中国自己未建立银行，中国的银行业就为外国人所独霸。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发生的金融恐慌，同它们操纵金融市场有密切关系。每次金融恐慌，都使中国的工商业受到很大冲击。于是，银行与货币的问题，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外国资本主义还运用各种方式扩大对清政府的影响。《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人李泰国、赫德先后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些外国人受聘为同文馆教习或参与洋务派办企业、建海军等活动，都为他们对清统治集团施加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赫德几乎成为参预清政府决策的人物，他代清政府采购军火，办理借洋债，插手清王朝的内政外交。赫德还写了《局外旁观论》，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向清廷提交《新议论略》，劝说清政府实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所需要的“新政”。这些文章对清统治集团有很大影响。此外，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用传教、译书、办报纸、写文章等方式，来扩大西方的影响，散播殖民奴化思想。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个英国记者就公开指出：传教活动“足以挈吾之旗及商务，同趋而并进”^①。

^① 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二十一，页三十四。

在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由外国人培植的买办势力又有所发展。这些买办们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效劳中发财致富，并凭借外国势力同洋务派建立了联系，有的因参与洋务派的经济、政治活动，受洋务派的赏识而被札委，有的则通过捐纳得到一官半职。例如，唐廷枢原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捐得道台衔，被李鸿章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徐润原是宝顺洋行的买办，以协助淮军镇压太平军余部“转运出力”，由李鸿章奏保加四品衔，招商局成立，被委为会办，后来又与唐廷枢合办开平煤矿。这些事实说明，随着买办势力的发展，有的人逐渐挤进清王朝官僚的行列，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清王朝发生影响。买办势力与后面将要谈到的洋务派封建买办官僚集团，都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

外国资本主义的新侵略活动，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使中国日益变成半封建社会；但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将她变成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正因如此，西方各国通过新的侵略活动，进一步操纵了清王朝的政治，加深了清王朝在财政经济上对列强的依赖，并使中国愈益成为供它们掠夺原料与输出商品的场所。就是这样，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半殖民地的泥潭之中。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实质之所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促进了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开拓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破产，又造成了劳动力市场，这些又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并给予一定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约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新式企业逐步地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从其产生时起，就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洋务派兴办的新式民用企业，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雏型；其二是民

族资本主义企业。

我国近代工业最早是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所谓洋务运动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国反动统治势力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目的是借西法的皮毛来支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反动统治，加强李鸿章、张之洞等买办官僚集团的实力，并通过办新式企业来控制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这个运动按其本质来说是反动的。洋务运动发生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打出“求强”“求富”的旗号，开始“师夷智”，进行办新式军事工业，建立外交机构，设同文馆等洋务活动。

洋务运动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而建立新式海军与兴办近代工商业，则是它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首先打出的是“求强”的旗号，从办军事工业，制炮造船，使用洋枪洋炮，建立新式海军等开始；七十年代以后，他们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筹海防，建立北洋、南洋水师的同时，又以“求富”相标榜，陆续地兴办了一批民用的近代企业。这样，就在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中国的头一批近代工业与交通企业。

在这批近代工业中，最早的是第一册中已提到的、由曾国藩在1862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官办的新式军事工业的开端。此后，李鸿章、左宗棠、崇厚、张之洞等先后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三十年间，办起这类军事工业约19个。这些军事工业，都是官办的机器工业。从七十年代开始，又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兴办了一批民用企业，最早的是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以后则有津沪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官局与纺纱官局等。从七十年代到1894年，约

有二十多个厂局。这些民用企业，已属于资本主义企业，但又具有明显的封建性、买办性与垄断性。

洋务运动(如办学堂、译西书、派学生出国留学及办企业等)为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某些条件并给予一定的刺激，但从根本上说，则起着妨碍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作用。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只能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引向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洋务运动中，清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官僚集团，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这个洋务派集团在清政府中占有很大的实力。他们掌管着清政府的外交和对外通商的大权，控制着新式海军与一部分陆军，掌握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长期盘据于两江、湖广、直隶等地区，而且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由于这些缘故，他们的主张和言论对清朝廷有很大的影响。

洋务派在办新式企业与处理对外经济关系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并且与各种反对意见进行论战，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经济观点。洋务派经济思想按其阶级实质来说是中国封建买办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意识，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而又反动的经济思潮。

清统治阶级内部因办洋务问题发生了分歧，反对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势力，形成了封建顽固派，并具有不同于洋务派也不同于后面将要谈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顽固派经济思想是当时在农村中仍占支配地位的腐朽的封建经济关系在思想上的反映，代表着最顽固的封建势力的利益，是一种极端保守而反动的经济思想。它反对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反对兴办近代工商业，反对变法维新，坚持“祖宗成法不可变”，主张“率由旧章”。他们连洋务派袭西方的皮毛都不赞成，更不必谈资产阶级改

良派的变法主张了。总之，他们顽固地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力图使中国长期停留于手工劳动与封建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这在实际上是维护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经济基础。

除了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之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也出现了。本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我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存在并逐步成长；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途径。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兴起，走的不是由工场手工业逐步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道路，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由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新式工业。如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上海公永和缫丝厂、上海同文书局、通久源轧花厂、均昌机器船厂等，就是由这些人投资兴建起来的。到1894年，一共办起了一百多家。总的说来，规模都比较小，经济实力不强。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也是本历史时期进步经济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从产生时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处境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它们在华的各种特权，先进的生产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与金融市场的操纵控制，排挤打击中国幼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使这些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刚建立起来就破产倒闭。所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虽然给予我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以某种刺激，但从根本上说，则是阻碍了它的生长。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反动腐朽势力，同样歧视和压迫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清政府不但施行“病商”的税收政策，而且不承认商民有兴办新式

工业的权利。比如，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办继昌隆缫丝厂，南海知县徐赓陛就曾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理由，下令封闭^①。又如李福明办机器磨坊，也被官府视为“刁商”，经“都察院奏准，飭令撤去”^②。至于官员吏胥们借故刁难，敲诈勒索，更属常事。许多封建顽固分子则指责近代的生产技术是“奇技淫巧”，还以使用机器、修铁路是“夺贫民之利”为借口，反对兴办近代工商业。洋务派的李鸿章等人，虽然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但又力图垄断兴办近代企业的权利。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向清廷奏请：十年之内，不准华商另行设局；举办轮船招商局，同样不准华商独自设局，“另树一帜”。这些情况说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从诞生之时起，就碰到来自国内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阻力，极其艰难地挣扎着前进。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社会中一个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了。最初的民族资本家主要是由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官僚、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由原来的手工工场主发展成近代企业资本家的为数极少。在本历史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过程，力量薄弱。这可以从外商、洋务派及民族资本家在近代企业的投资额得到说明。例如，外商的一个祥生船厂就有资本80万两，宝昌丝厂也有资本80万两；洋务派所办的19个属于采矿与制造工业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也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余万元^③；而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全部新式采矿业和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机器工业等54家企业，总共才有资本四百八十余万元^④。这个对比，说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还很弱小。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下册，第964页。

② 同上，第968页。

③④ 根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表1统计。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及外国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这就决定了它有反对封建主义压迫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革命性一面；又由于这个阶级力量薄弱，在经济上、政治上与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决定它存在着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这些特点明显地体现于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的言行之中。尽管如此，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也逐渐地形成了，它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意志与利益。为了发展民办的近代工商业，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们批判了重本抑末等传统观念，提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主张，阐发了变法自强、振兴工商，以及财政金融改革主张，形成了不同于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的经济思想，从思想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成为本时期最重要的进步的经济思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十九世纪末，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地转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争夺殖民地与瓜分世界领土的角斗。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侵略势力发动了侵华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清政府又告失败。这一事实不仅暴露了清朝廷的昏朽无能，也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新政”的破产。1895年，日本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等等之外，帝国主义还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开矿筑路的特权。《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它们除了加强商品输出之外，更利用新攫取的特权，加强对华输出资本。西方列